

# 中美出版物交换的历史实践分析 (1949-1979)\*

——以北京图书馆<sup>①</sup>为例

张 娱

(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摘要】**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促进图书馆外文献资源建设,推动不同文化互通互鉴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北京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档案的梳理,分析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建交三十年间北京图书馆与美国文化机构进行出版物交换合作的内容与特征。梳理并总结这一特殊时期中美出版物交换的历史实践,对明晰未来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战略方向,推动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出版物 国际交换 北京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中国与美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被视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梳理总结两国的文化交流史是研究两国关系、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途径。中美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双方虽然在历史文化、具体国情、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始终存在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现实需求。自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建交,中美图书馆文献交换在传播知识、沟通民心、营造两国间良好合作氛围方面始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北京图书馆克服重重压力通过交换渠道从美国图书馆征集了大量科技资料,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北京图书馆交换至美国的出版物成为美国知识界了解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为新中国海外形象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此种境况下,重新回顾中美出版物交换史、总结中美文化交往的规律与经验对当下我国图书馆提升对外文化交往水平大有裨益。

目前对相关历史的梳理与总结数量较少。有学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外图书馆的交流情况以及我国图书馆与国外文化机构的出版物交换历程,其中囊括了中美出版物交换的部分史料<sup>[1-4]</sup>。此外,对中美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交换的介绍以及从美方角度叙述的交换史也对该领域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sup>[5-8]</sup>。本文以北京图书馆的纸质档案为依据,细致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至中美建交北京图书馆与美国文化机构开展出版物交换的历史进程,对双方合作的具体特征进行了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总结性分析,探求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同时进一步充实中外图书馆交流史的相关研究。

## 2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出版物交换的历史与实践

### 2.1 1949-1956: 艰难开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实行敌视、封锁、遏制的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正视中国,对中国的外动向保持高度关注。随着 50 年代中期远东局势的缓和,中美之间也逐渐出现沟通的契机。1955 年 8 月 1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该会谈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打开了官方接触和联系的渠道。在准官方层面,中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出版物交换赠送与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19137Q0381) 成果之一。

<sup>①</sup> 北京图书馆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 1909 年成立的京师图书馆。1928 年 7 月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51 年 6 月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和美国的图书交流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

中国文联在与海外知识界联系的过程中与一批高校达成了包含出版物国际交换在内的一揽子合作意向。中国文联将相关内容以公文形式转至文化部,并责成北京图书馆承接落实。在中国文联的积极推动下,1955年北京图书馆先后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交换关系<sup>[9]</sup>。

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换组成立于1951年,在外汇紧缺、进口贸易受限的条件下实行“以换代购”。开展国际交换是当时北京图书馆建设外文资源的重要途径。1955年北京图书馆通过非贸易渠道获取的西文图书数量占西文入藏总量的65%,当年从美国换得图书788册,在交换赠送渠道中占比36%,仅次于英国。我方从美方获取的主要为科技文献。该批图书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一五”计划启动以来的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作为往来,美方也积极地向我方征集图书,题材多为红色文献与传统文化读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知识界对中国的关注方向。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资源有限,国际局势处于紧张状态,加之中美官方邮路不畅,图书与邮件均需从香港中转,北京图书馆与美国文化机构的出版物交换工作可谓开局艰难。然而在中美隔绝的社会大环境下,美国通过文化领域的接触得以不断扩展对新中国的认知,中国也借助出版物交换渠道征集了一定数量的科技书刊,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双方在准官方层面建立起一条较为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在试探接触中形成正向有序的互动,这种互动为彼此后续合作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 2.2 1956-1972: 曲折上升

1956至1972年,北京图书馆与美国文化机构的交换业务呈现出先扬后抑再扬的特征。中苏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凸显了中美扩大合作的必要性。中美出版物交换除中间数年的波动外总体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的促成,更有交换主体对形势的灵活把握与对工作重点的及时调整。

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文化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提出大型图书馆的工作重点是科学研究服务<sup>[10]</sup>。此后的两年,北京图书馆与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杜克大学等一系列高校图书馆建立了交换合作关系。

50年代后期,中国和苏联在涉及国家安全等一

系列重要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关系逐渐恶化。1949-1959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获取的俄文图书高达二十余万册。尤其是1956至1959年间,北京图书馆收到的苏联出版物的年登记数量均保持在40000册以上。根据当时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采访方针,科技书刊在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因此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的外文科技文献主要源自苏联。中苏关系交恶迫使交换工作亟需拓展新的渠道。

20世纪50年代末,“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式微,美国国内逐渐出现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1959年美国出台《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其中建议逐步开始与中国交换记者并且开展学术、商业性质的交流<sup>[11]</sup>。北京图书馆接收到美国文化界希望接触中国、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进一步拓展与美国各类图书馆、研究机构、学术协会的联系,仅1959年一年与北京图书馆建立出版物交换关系的美国文化机构就有60余家。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给我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北京图书馆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推进与美国文化机构的交换业务,在1960至1964年与50余家美国单位建立出版物交换关系,力争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文献服务。应国内单位委托,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美国材料工程师协会(ASME)和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论文集和会议录等难以通过贸易渠道获取的材料。1963年北京图书馆从哥伦比亚大学征得四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资料以及一种化工类期刊。当时正值哥伦比亚大学中文馆扩建,急缺重要馆藏,北京图书馆以交换形式提供了大量社科人文类书籍、期刊,其中包括《人大常委会公报》《今日新闻》等时事类出版物,该馆随后成为各国学者、政治家了解和研究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窗口。出版物交换既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文献保障,更成为中国正面宣传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美的出版物交换工作逐渐陷入低潮。该阶段对外工作的思想基础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中美作为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两国的非官方交往也受到较大的影响。北京图书馆先后与一百余家美国交换机构中断了联系。两国的出版物交换维系在较低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出版物基本停寄的情况下,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依然坚持向北图邮寄书刊,从不间断。中美建交后,北京图书馆的领导特地向钱先生表示了感谢<sup>[12]</sup>。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各方人士对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表示强烈不满。1966 年 3 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廷的建议下召开了自 1949 年以来第一次中国问题听证会。听证会期间费正清、鲍大可等 198 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情况,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sup>[13]</sup>。1969 年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缓和,中美出版物交换工作出现了回暖的趋势,交换的种类和数量均有所上升。外发报刊内容涉猎广泛,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新华电讯》等党政时事读物,又有《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人民文学》《动物学报》等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类刊物。与此同时,美国的图书机构加大了对政治类书籍的征书需求。哈佛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频繁发来征书清单,所征书目与新中国的政体及时事密切相关,如《共产党宣言》《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等。美国在这一时期加大了对相关书籍的征集数量,表明美国战略情报收集分析及与此相关的对华政策调整已处于关键阶段。

### 2.3 1972-1979: 广泛合作

1972 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中国,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73 年 9 月,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率团访美,开启了中美图书馆合作的新篇章<sup>[14]</sup>。北京图书馆与美国文化机构的出版物交换工作迎来新的生机。1972 至 1979 年,北京图书馆与美国 70 余家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相关单位除了传统的公共馆、大学馆外,还包括众多的博物馆、研究所、学术协会以及银行、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这一阶段的出版物交换在主体的多样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上均实现了突破。缩微胶卷、音像制品成为重要的交换内容。北京图书馆从美国交换获取的书刊也不再局限于西文,间或有俄文甚至是在中国台湾出版的书籍。引进的刊物从以自然科学为主转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重。一批高质量的美国人文社科期刊被纳入交换内容。外发期刊的主题也进一步多元化,学科类别齐全,品种不断丰富。

该阶段北京图书馆延续了与美国高校的良好合作传统,与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法学院等具有中国学研究背景的机构关系尤为密切。双方在沟通方式上日益灵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除了向北京图书馆发送常规的交换目录与资料征订需求外,

还会主动寄出本机构的年度出版目录、展览目录、期刊索引,发来问卷调查,以期丰富交换资源,使效益最大化。北京图书馆与美国各类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反馈制度,相互分享文献交换的成果,对工作中的细节及时沟通。部分馆员离开岗位前会专门向对接方发送致谢函,回顾双方友好合作的历史。美国出版物交换项目的负责人访华时受到北京图书馆的热情接待。这种微观层面的互动已经突破了常规业务的范畴,成为一种以平等、友好为基调的人文交流。这类人文交流在简化协调流程、推动交换工作走向深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72 至 1979 年,与中美关系及国际事务相关的文献成为双方书目征集的重要目标。1972 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渠道向哈佛大学图书馆征得《兰德公司对中国政策报告》《总统中国之行》等资料。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公报》生效,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哈佛大学法学院随即请求北京图书馆寄去《人民日报》关于中美建交的号外。

此外,该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北京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落实文献交换协议。双方虽然在 1955 年建立了交换关系,但受美国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的影响,实际交换量极其有限。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趋势下,中美文化领域的民间外交日益频繁。富布赖特听证会后,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其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促进美中学术交流。同年 6 月,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成立。上述两个组织试图为中美两国的全方位交流提供多元的信息服务平台<sup>[15]</sup>。最终美国国务院批准国会图书馆提出的同北京图书馆扩大交换合作的请求。以此为背景,美国国会图书馆分别于 1968 年、1970 年两次致函北京图书馆,建议在完善交换协议的基础上开展书刊的交换赠送工作。鉴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政府属性,北京图书馆受当时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影响未予回复。1971 年 9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芒福德(Lawrence Q. Mumford)致函周恩来总理,提及希望能落实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制度,发扬优良传统,实现互惠互利。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大趋势下,1972 年 6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到访中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就落实交换赠送的相关协议交换了意见。王冀回美后,致信北京图书馆馆长,进一步明确了交换意愿,一并附上国会图书馆的交换纲要及两份交换目录。1972 年 10 月北京图书馆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寄来的 52

册图书,回赠对方 237 册图书,其中包括一部中华书局 1961 年重印的简编本《永乐大典》<sup>[16]</sup>。此后双方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截至中美建交前,北京图书馆是国内唯一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签署交换协议的文化机构。

1979 年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一项科技合作协定与一项文化协定<sup>[17]</sup>,次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政府出版物交换关系。在此之后中美图书馆领域的交流和互访日渐频繁,合作方针趋于务实,中美间各渠道、各层次的文化交流得以广泛开展起来。

### 3 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建交期间中美出版物交换工作呈现的特征

#### 3.1 出版物交换规模受外交关系影响

出版物国际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但与之并不完全是平行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纵观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建交期间中美出版物交换的发展轨迹可知,中美关系缓和有助于出版物交换工作的开展,然而国家建设困难、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也可以是中美出版物交换关系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中美政治隔绝、充满敌对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两国的出版物交换在 1956 年、1959 年出现了两次高潮。60 年代末中美关系处于谷底时双方的来往亦未断绝,间或还有个别年份成果颇丰。对于中美两个大国而言,除了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官方外交外,还存在着广阔的准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该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主体多元、层次丰富,受政治关系的束缚相对较小,其发展繁荣对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北京图书馆与美国文化机构的出版物交换作为中美准官方层次的交往与中美关系呈现出趋势相近,但并不完全平行的特点。

#### 3.2 工作重点从辅助建设西文馆藏到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出版物交换着重解决了国家由于外汇不足、邮路封锁等原因造成的西文馆藏建设困难的问题,其主要目标是搜集相关情报,为经济建设与科学研究服务。美国是国际权威著作期刊的重要出版地之一,对于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但是通过进口贸易难以获取的书刊,北京图书馆常常能通过创造性的交换方式予以获取,弥补了图书贸易渠道的局限性。60 年代随着美国国内改善对华关系舆论的兴起,出版物交换逐渐转变为中美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的平台。经由出版物交换抵达美国的文献成为国际社会了解新中国的重要媒介。周恩

来总理曾多次强调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我国整体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是寻求友谊,寻求知识<sup>[18]</sup>,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多地体现为需求导向,其驱动力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出版物交换作为中美文化互动实践的一种方式对于两国合作观念的构建具有特殊意义。

#### 3.3 合作对象以美国高校为主

自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建交,美国高校一直是中美出版物交换的重要参与方。首先,美国高校具有参与文化外交的传统。美国高校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国家智库的部分职能,广泛开展政府决策咨询与人才培养工作。政府也鼓励高校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协助解决国际问题<sup>[19]</sup>。其次,美国高校存在与中国进行出版物交换的需求。朝鲜战争后新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与研究兴趣空前浓厚。二战后,中国学的研究中心逐渐从西欧转移至美国。设有中国或亚洲研究机构的大学、攻读中国学课程的研究生数量以及汉学博士学位的数量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sup>[20]</sup>。中国地区研究以及与中国学相关的课程需要大量的文献支撑与信息保障,美国高校图书馆迫切地需要扩大中文馆藏。因此美国高校在与中国图书馆界的文献交换、资源共享、互动提升方面一直持积极态度。

#### 3.4 华人群体对促成中美出版物交换发挥了特殊作用

美国的几代华人移民在爱国情结的感召下于中美图书馆交流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如前文中提到的学界泰斗钱存训先生,长期坚持推动促进中美图书界的交流活动。钱先生 1949 年起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50 年代率先与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六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的低谷时期坚持向北京图书馆邮寄书刊。钱先生还先后向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赠书共计数千册,其中不乏稀世珍藏以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为中美文献交流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sup>[21]</sup>。再例如文中提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他主导并落实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首次正式的文献交换。他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学术顾问,多次积极促成中美图书馆界的互访与培训,妥善安排具体事宜,主动联系美国图书资料管理委员会,争取拨款用于支持北京图书馆的中层管理人员赴美学习编目与自动化,数十年来在中美文化交流事业中助力良多<sup>[22]</sup>。在中美图书馆文献交换的合作历

程中,广大华人图书馆员凭借自身优秀的素质以及对弘扬中华文化的热情做出了光辉的业绩。

## 4 启示

### 4.1 在逆全球化的困境下坚持扩大对外交往

近年来美国两党竞争、贸易战、叠加新冠疫情导致美国的对华舆情不断恶化。美国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打压,在人文教育领域也不断设置障碍,挑动“中美脱钩”。面对逆全球化的威胁,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出版物交换作为双方长期以来沟通与互动的有效渠道,在这个中美关系的特殊时刻应当得到重视。自 2006 年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承办“中国之窗”项目,每年向海外图书馆赠送一批有助于宣传中国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图书。美国各大图书馆是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拥有汉学机构的图书馆,在项目的沟通中反馈及时并且高度认同该项目的价值。在今年的一项满意度问卷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反馈来自美国,美国用户对文献内容的满意率高达 83%。

作为“新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未来的对美出版物交换工作应善于把握形势,持续拓展与美国图书馆、研究机构的文化交往,积极捕捉美国文化界的对华舆论动向,利用制度性规范在中美交换单位间建构出一种相互依存、协同互补、增值共赢的关系,在共生机制中强化彼此的合作。

### 4.2 进一步开发中美出版物交换的国际传播效能

图书交流是文化走出去的核心要素。在图书馆领域,常态化的出版物交换、赠送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美国图书馆的东亚馆向来重视通过交换、接受赠送等渠道充实馆藏。早在 1975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通过交换入藏的文献比例就达到了 50%<sup>[23]</sup>。在中美人文交流战略化的形势下,出版物的交换与赠送是我国增强对外联系、强化国际认同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美出版物交换工作持续发挥对外文化传播的平台功能,用心甄选优质书目,积极创新传播形式,努力推广中华文化及其核心价值。

与其他人文交流形式相比,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出版物交换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出版物交换受政治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次,出版物交换的合作成本相对可控。相较于大型会议、团队出访等对资金依赖程度较高的活动,出版物交换对资金的依存度更为灵活。交流规模可根据财政预算进行随机调节,项目所需求的最小限额

也相对较低。图书作为思想的承载实体,从传播知识、促进交流的视角观察其实际价值远远超出了商品意义上的定价。此外,新冠疫情期间不依赖于两国人员实际接触的图书交换可以视作国际文化交流的优选形式。虽然出版物邮包仍有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但图书馆可通过多次消杀、加长静置期等多种科学有效的方式避免病毒的输入。高效的数字化文献交换更是进一步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因此,出版物交换在新形势下具备更为突出的国际传播效能。

### 4.3 提升与美国高校的合作水平

美国知识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研究成果常常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立足于真实材料的对华研究可以有效降低出现认知异化与形势误判的概率,对缓和中美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图书馆寄往美国各大高校的中文材料一度成为美国汉学界了解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依据。同时期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向与美国汉学家群体的论证宣传工作不无关系。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为学者与专家提供了参政渠道。美国政界与学界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知识群体的影响力可以直接渗透至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sup>[24]</sup>。图书馆的对外交流应重点把握这一特点,在图书馆预算普遍削减的情况下,以美国高校作为工作重心,利用好与美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悠久而深厚的合作关系,定向输出倡导理性发展,强化价值共识的优秀作品,在获取美国前沿资讯的同时为美国知识界尤其是汉学界的学者提供正向长效多渠道的文献支持。

### 4.4 重视华人馆员在中美出版物交换工作中的作用

美国的华人众多,图书馆员成为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中产阶级的职业选择。他们掌握多种语言,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更容易被接纳<sup>[25]</sup>。美国图书馆的华人馆员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熟知中国的历史文化且熟练掌握中英双语,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双方的沟通成本。我国的出版物交换应该加强与在美华人同仁的联系,积极沟通回应相关信息,有意识地将双方的交流合作推向深入。“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sup>[26]</sup>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在这方面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可以发挥强大的助力。然而随着华人新生代逐渐成为美国华人社会的主体,如何构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使新一代在未来中美文化交流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将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5 结语

出版物国际交换不仅是图书馆建设外文文献资

源、搜集域外信息的必要手段,更是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平台。图书馆在新形势下应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发扬老一辈图书馆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扎实稳健的工作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理念,细化政策,着力开发多元高效的跨文化对话途径,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完善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厚植两国和平友好的民意基础做出自己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L.J.埃里克森,B.J.福特.中美图书馆合作与交流[J].陈亚维.摘译.世界研究与开发报导,1987(8):19-20,29.
- (2) 刘兹恒,朱荀.当代中国图书馆的国际交流(1949-2009)[J].图书馆杂志,2010,29(1):2-7.
- (3) 李健刚.国家图书馆国际书刊资料交换工作的新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报,2002(4):33-38.
- (4) 马静,黄曼丽.国家图书馆书刊国际交换发展史浅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90-91,122.
- (5) 张玮,李伟.以出版物国际交换为媒介的政府出版物海外传播机制研究[J].图书馆,2017(3):101-105,111.
- (6) 王冀,万惟英,马敬鹏,等.中国古籍在美国[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1):105-107.
- (7) 徐春裕.中美出版物交换史话[J].图书馆杂志,1988(2):51-52.
- (8) 马大任.“赠书中国计划”的创立[J].图书馆杂志,2008(2):18-23.
- (9) 李伟,马静.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物的国际交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4):119-125.
- (10) 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N].人民日报,1956-08-28.
- (11)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02.
- (12) 富洁.钱存训先生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J].图书馆学刊,2022,44(2):107-110.
- (13) 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J].美国研究,1997(2):69-86,4.
- (14) 钱存训.中美图书馆代表团首次互访记略(1973-1979)[J].国家图书馆学报,2003(4):74-77.
- (15) 顾宁.1949-197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J].理论视野,2009(8):46-49.
- (16) 徐春裕.中美出版物交换史话[J].图书馆杂志,1988(2):51-52.
- (17) 顾宁.1972至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顾与思考[J].世界历史,1995(3):57-66,128.
- (18) [20] 李喜所,刘景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五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9,399.
- (19) 吴业春,李建强.美国一流的高校智库功能定位及特色发展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5):89-95.
- (21) 邱嘉怡.钱存训先生对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事业的贡献[J].图书馆界,2015(6):54-57.
- (22) [23] 王冀.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5,26.
- (24) 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国际问题研究,2010(2):13-18.
- (25) 张芳,李刚.美国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研究述略[J].图书馆论坛,2017,37(7):93-100.
- (2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C]//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6.

(作者简介) 张娱(1988-),女,硕士,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史。

## Historical Practice Analysis of the Public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49 to 1979 ——Taking Beijing Library for Instance

Zhang Yu

**[Abstrac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libraries and strengthening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The research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ation exchange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Library and U.S. cultural institutions from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sorting out the fil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of Beijing Library.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a-US publication exchange of this special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China-US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Beijing Library; China-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谢 雨)